

儒行天下

青
田
华
侨
文
化
研
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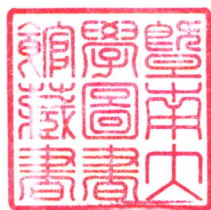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

D634.1
20113

华人中心

青
田
华
侨
文
化
研
究

儒行天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侨行天下 / 吴晶 主编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10

(金盏文荟 / 高松年 主编)

ISBN 7-80171-888-7

I. 侨... II. 吴... III. 文学—作品集—浙江省—当代
IV. I21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8742 号

侨行天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16 印张: 26 字数: 395 千字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888-7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4062964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僑行天下
地藏名石

周慧蘭



序一



青田是全国著名侨乡,有着长达300年的华侨史。“天下行侨,地藏名石”,是侨乡青田的真实写照。

早在明末清初,勤劳、智慧的青田人持叶蜡石,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发展,从而成为了早期的侨民。

在异国他乡,青田人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历经艰难、百折不挠,成就了事业,炼成了独特的青田华侨精神,形成了“吃苦耐劳、质朴敦厚;团结互助、重情尚义;至诚积善、乐于奉献;勇于拼搏、开放奋进”的青田华侨文化。在青田华侨身上,折射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可以说,青田华侨史是浙江华侨史的一个缩影,青田华侨精神是浙江精神的一个烙印。

华侨文化既与海外文化相交融,又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是一种具有特殊作用的精神文化。无论在过去、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位置。开展对青田华侨文化的研究,通过一个故事、一篇文献、一段历史,寻华侨的“根”,牵华侨的“魂”,使大家亲切地感受到华侨在海外的奋斗史、创业史、发展史,让华侨文化世代相传,让华侨精神永载史册。

浙江省侨联组织编写的《侨行天下——青田华侨文化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全面、真实地记录了青田华侨的起源、发展历程和脉络轨迹。本书既有理论阐述,又有现实解读;既有文化背景研讨,又有实践课题调研,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关于华侨历史、文化、理论研究等方面的精品佳作不断付梓问世。

是为序。

浙江省政府副省长

鍾山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四日



序二



侨情是推进侨务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青田是著名的全国重点侨乡，我省历来重视青田侨情研究。省侨联为了加强对青田侨情的研究，特委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进行专题研究。今此项工作已经完成，其成果是由侨联副主席吴晶任主编的《侨行天下——青田华侨文化研究》，并即将梓行，这是值得高兴和庆贺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成立了侨史研究室，编印了《浙江华侨史料》等刊物，当时曾设想将本省几个重点侨乡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写专题性论著。现在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陈野研究员牵头组织周望森、章志诚等侨史研究老专家和年轻学者张学继、徐立望、徐剑峰、吴雪萍、罗以民、郭剑波、赵敏、徐佳等集体撰著，终于完成了这部颇具特色的青田侨情研究论著。

青田为浙南一个小县，但是由于侨乡关系闻名于世。在一二个世纪前，青田人几经长途跋涉，循着西伯利亚来到了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经由东欧转至西欧，尔后又有一批人从海上漂泊，远渡重洋来到欧洲的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1933年邹韬奋先生在《萍踪寄语》中就写到在欧洲碰到许多青田籍华侨，“提箱奔跑叫卖”青田石、花生糖等小货，“饮泣吞声”地艰难生活在异国他乡，人数竟达三四万之众，受尽“践踏侮辱”，还常受到“外国警察驱逐毒打。”（参见《萍踪寄语》初集第25篇《在法的青田人》；二集第49篇《荷兰的商业首都》，三联书店，1987年）但是他们却顽强地生活下来，携亲带戚在欧洲形

成了一个以青田人为主(约占80%)的华侨群体。他们“含辛茹苦的能力,颇足以代表中国人的特性”(同上引文),共同创造了世界文明,他们的功劳永著于史。萧乾先生说他们是“漂泊全欧的‘吉普赛人’”,“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许多美德。”(《海外行踪·梦之谷序》)

人们不禁要问,青田是一个不显眼的山区小县,为什么成为全国著名侨乡,它既不像广东的潮汕、福建的泉州,有靠海的地理优势;又不象云南等省有接壤邻国之便利。这就不得不追溯到青田独特的侨情。青田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穷乡僻壤。“重山复水,高深险阻,无平原广野林麓蔽泽之饶……终岁勤苦而不得一饱。”(清光绪《青田县志》卷一《舆地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第205册,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清初邑人徐上成说:“无平田衍土以耕,无柔桑良葛以织,无鱼盐商贾之利,无畜牧贩卖之饶,东南之饶壤也。”(同上志书,卷三《贡赋志》·《蠲荒记》)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的1.41亩水平(青田为0.38亩),就不可能依靠土地出息以糊口。好在青田多产叶蜡石,这种由高温溶液与火山岩互变的流纹岩和凝灰岩蚀变而成的矿石,玲珑剔透、晶莹如玉,可以精雕细刻成人见人爱的工艺品。我少年时在温州打锣桥一带青田石雕小店里常见到栩栩如生的猴子、狗、象等动物石雕工艺品,驻足顾盼而留连忘返。青田人心灵手巧,就地取材雕刻成的石雕工艺品,循着瓯江直下港口城市温州,漂泊到欧洲各国,青田人边走边卖以维生。有史可查在嘉庆二年(1795)青田山口镇留国云携带着青田石到日本贩卖。1935年英文版《中国年鉴》记曰:“早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西伯利亚前往欧洲从商,初期前往以青田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带着一担青田所仅有的青田石由温州而漂流至上海……由上海漂流到欧洲来……把所带的青田石雕成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排出来……不久发了小财……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近两千。”(韬奋《在法的青田人》,同上引书)这就是青田华侨的原生态。很像湖北天门县的华侨靠剪纸花捉牙虫一样,都是靠手艺而立足的中国内陆两个地区的独特侨情(凡研究侨史者,都会重视青田、天门的独特侨情侨史的重大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也就是说贩卖青田石是青田华侨初始阶段外出的诱因,青田石也就成为青田华侨贩卖商品的载体。徐立望把华侨形成归纳为经济压力、石雕工艺、交通(地理)位置、文化因

素、移民意识五个因素也不无道理(移民意识应属于文化因素,参见本书)但是后来的青田华侨出国则是凭勤劳艰苦精神,靠手艺以小商小贩维生。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情况有了大变化,已与青田石雕无直接关联了。尽管如此,但研究青田侨史侨情还是不能不追究到青田石雕。

如今青田华侨有20余万人分布于全世界100余个国家,占青田人口的42%以上,成为全国著名侨乡。它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丹麦学者朱梅(METTE THUNO)博士曾多次来青田实地调查,撰著了颇具分量的欧洲侨史论著(其中涉及青田侨史占相当篇幅,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青田侨情侨史的独特性,就构建了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984年全国侨联领导人洪丝丝在《努力开创华侨历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刊于《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4年第一期)号召:“最好有人研究温州、青田的华侨史。”现在《温州华侨史》(章志诚主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出版)已经出版。

《侨行天下——青田华侨文化研究》则是全方位研究青田侨乡的论著,从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多学科多视角来审视侨情侨史,将它纳入全球化的大背景大视野下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新尝试新创造。尤为可贵的是研究者深入实地调查,将田野作业、文献记录、口述历史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者是老中青结合,各发挥所长,古今结合,重视现实,开拓了研究新路子。其科学性、客观性更符合时代要求,既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当然,这部论著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当有待于今后有更好的学术专著问世。本书的出版将会得到党政领导、侨务工作者的关注,也会得到侨胞侨眷的关注,从中汲取亲切的侨情乡谊。

是为序。

陈学文(著名华侨史研究专家)

2006年于杭州

目录

CONTENTS

序一 钟 山	001
序二 陈学文	003

文化研讨篇

第一章 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	003
第二章 青田华侨基本情况概述	027
第三章 青田石雕——早期青田华侨走向世界的独特介质	045
第四章 青田华侨之东渡日本	063
第五章 青田华侨之移居欧洲	082
第六章 青田华侨海外经营模式解剖	103
第七章 异乡的消解——青田华侨与居住国主流文化的双向认同与融合	128
第八章 青田华侨与青田本土文化	142
第九章 青田华侨与浙江精神	161

现实调研篇

青田侨乡经济现状与发展研究	183
海外积累 回国投资 走向现代化	202

青田籍华侨华人外贸群体的发展趋势及培育建议	214
青田籍侨团发展特点和现阶段矛盾释疑	219
华侨华人子女的华文教育研究	232
青田石雕业的现状及国内外市场拓展的思考	254

访谈口述篇

德国华侨周王汉先生采访记录	275
葡萄牙华侨周一平先生访谈记录	285
意大利华侨陈侠先生访谈记录	297
美国华侨徐艇先生访谈记录	309
附录一 新华人移民体系之社区与认同	315
附录二 浪迹天涯谱春秋 搏击四海业竟成	327
附录三 青田人移民巴西及其创业简史	348
附录四 青田华侨社团一览表	386
附录五 日本关东大地震中青田旅日华工被害者姓名一览表	391
附录六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98
后记	403

文化研讨篇



藏板外文



第一章

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从“闭关锁国”到国门洞开

人口的迁徙与流动,表面上看似乎属于个人行为;但实际上,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因此,研究华侨问题自然不能离开大的时代背景的分析。

我国学术界公认,中国人移居海外自古以来即有之。但可惜的是,由于遥远的古代缺乏明确可靠和完整的史料记载,我们无法知晓其规模和具体的数字。

根据《史记》的记载,在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在众多文武大臣的簇拥下,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渭河南岸的驿道东行,巡视被他消灭了的齐、楚两国故地。当秦始皇一行来到原齐国琅邪(今山东境内)时,齐人徐市(徐福)等上书,声称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有仙人居住在上面,请求秦始皇派遣童男女前往求仙。一直强烈渴望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听说海上有仙人,当即下令调遣3000童男童女由徐福带领前往海上求仙。现在,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世界上哪来的神仙?徐福求仙不得,竟一去不返。秦始皇久候徐福不归,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快快离开了琅邪。传说徐福带领的3000名童男童女后来漂流到了日本列岛。如此说确实,则徐福与那3000名童男童女当是前往日本的第一批大规模的中国移民。

应当说,中日两国都有很多人相信此传说是真实可信的。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即有描写徐福东渡的诗篇:

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

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

秦代以后,历代都有零星的中国人前往日本。到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日本国登记在册的“秦民”达到7053户。^①

随着人类地理知识的增加与造船航海技术的日益进步,人口的流动就更加方便和频繁了。特别是在朝代更迭、战争与动乱频繁的年代,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或逃亡,早期华人迁徙或逃亡的目的地主要包括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西北、西南等周边国家。

从12世纪初(南宋建炎元年)到16世纪后半期明代开放海禁,前后四五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峰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力远远高于周边国家,成为亚洲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当时的东南亚各地仍然停留在原始公社制度和封建领主制阶段。中国生产的商品包括丝绸、陶器、瓷器、漆器、铁器、铜器、银器、铜钱以及各种手工业品深受东南亚各地人民的喜爱,中国和这些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一部分中国商人、水手在当地居住下来,成为早期的华侨。

根据学者的估计,这个阶段,留在东南亚的华侨人数在10万以上。有些华侨集中居住在一起,在当地形成独特的华人社会,他们一直保持着汉民族的风俗习惯。随着当地华侨社会的出现,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华侨领袖,有的雄踞一方,有的还成了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如安南国王李公蕴、陈日熨、黎犛季,婆罗国王闽人某某等。^②

浙江人走出国门的历史也同样漫长。1241~1251年间,浙江人王德用曾赴交趾(今越南),交趾国王“厚礼待之”。又据《宋史·陈宜中传》记载,浙江人陈宜中在南宋灭亡后,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出走暹罗(今泰国),死后即葬在暹罗。^③

明朝初年,在中国延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据史籍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同年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同年八月,“倭寇淮安”。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

倭寇的频繁入侵和骚扰,迫使朱元璋决定采用闭海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四年(1381年),丞相胡惟庸“通倭”罪名坐实后,朱元璋大怒,决定立即断绝与日本的一切联系,宣布了“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的政策。二十七年(1394年),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与诸番互市者,必真之重法。”这种严厉的禁海政策,不仅强行切断了沿海各省与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断绝了中国沿海各省的人们走出国门的可能性。直到明朝中后期,禁海政策才放松,国人才有机会走出国门。

清朝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特别是郑成功政权,清朝推行了比明朝更加严厉的禁海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浙闽总督上奏,建议“沿海省分应立严禁,毋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清廷采纳这个建议,于次年发布上谕说:“海氛未靖,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何由廓清?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④禁海之外,还采取“迁界”的措施,强行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距海边几十公里以内的老百姓驱赶出家园,数百万人被迫迁移,数以千万计的耕地抛荒,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

清政府对违令出海者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凡官员民兵私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以通贼论斩。又州县同谋,或知情隐匿,亦将处斩。”“凡国人在藩托故不归,复偷属私回者,经拿获,即行正法。”^⑤对于在边关巡查的官兵,也规定了详细的奖励和惩罚措施。^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布解除禁海政策,准许开海通商。次年,又下令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这四个海关分别设在今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当时名义上是四口通商,但中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处。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辉(James Flint)率领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等地贸易的重大事件,乾隆接到浙江疆吏的奏折后迅即批示:“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近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

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⑦

在乾隆看来，洋船洋商到浙江，其目的是与“奸牙勾串渔利”，而且“浙民俗易器，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他担心宁波演变为澳门第二，故此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从此不准洋船进入浙江海口。乾隆二十三年上谕称：“明岁赴浙江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上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⑧

这样，清朝的政策由四口通商变为广州“一口通商”，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为止。

对于清廷的这种“闭关锁国”政策，马克思在《中国和欧洲的革命》一文中指出：“清朝统治者，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由于这些考虑，当时除了经由一个距离北京及产茶区极为遥远的城市——广州以外，外国人被禁止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往来。”^⑨

清朝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持续了将近百年，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强行打破。

实事求是地说，清朝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国人大规模出国的效果，但是它不可能完全阻挡住国人出国的步伐。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东南沿海有数千公里的海岸线，清王朝的水师可以守住比较大的和著名的港口，却守不住无数的小港，老百姓仍然可以从无人看守的小港偷渡出去。

第二、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沿海地区土地贫瘠，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封建地租剥削的日趋严重，在本地谋生越来越困难，不得不铤而走险出洋谋生。时人形容：“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

第三、1684年，康熙宣布解除禁海政策，准许开海通商。虽然后来只留了广州一个口子，但毕竟有了正当出海贸易的通道。许多人借生意为名乘船远走他乡，到达目的地后就在当地定居下来，清王朝对此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

由于通商口岸在广州，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华人出国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两省，出国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根据学者的估计，在鸦片战争以前，